

劃時代的上海教務會議

柯毅霖¹

本文為紀念 1924 年上海首屆教務會議 100 週年，探其起源、重要性、影響力和遺澤，並對一年來各界舉辦的學術與教會論壇進行綜合評價。由於觸及了傳教事業和殖民侵略的主題，作者提出諸多反思。最後亦提議舉行第二次華人天主教教務會議，給予一些議程建議。

前言

2024 年是上海會議，或更準確地說，是第一次中國教務會議的一百週年。這場會議為教會的本地化（即將領導權委託給當地神職人員）和文化適應（即通過當地文化形式表達信仰）開闢了道路。

本文介紹、總結和反思紀念上海會議或第一屆中國天主教教務會議一百週年的學術和教會活動。週年紀念會議包括米蘭和羅馬（2024 年 5 月 20~21 日）、澳門（2024 年 6 月 26~29 日）；及其他關於中國教會的會議，在芝加哥、魯汶和科隆舉行。據我所知，對於上海會議的紀念與反思至少召開過四次會議，這次在輔仁大學，由魯汶南懷仁基金會和輔大天主教學術研究院主辦

本文作者：柯毅霖神父，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會士，現任米蘭 Pime 中心主任、《亞洲新聞》及《世界傳教組織》編輯部主任、意大利米蘭天主教大學神學教授。本文承蒙古偉瀛教授協助中譯，特此致謝！

是第五次。參與會議的學者和教會人士（包括教宗方濟各、帕羅林樞機和塔格勒樞機主教、沈斌主教）²都談到了上海會議。我將嘗試對這些事件的內容和意義提出個人的綜合看法，探討其歷史意義，包括在神學視野上有何啟發，以及中國福傳的現狀和未來的挑戰。我的建議是，在第一次教務會議 100 年後，在全球教會主教會議的背景下，非常需要舉行第二次華人天主教教務會議，而我也提出了第二屆會議的議程建議。

一、上海教務會議：起源、重要性、影響力和遺澤

上海會議（192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2 日）是中國天主教會的一件大事，即使在今天也對普世教會具有重要意義。會議的正式名稱是中國天主教第一屆教務會議。1924 年 5 月 15 日，許多人目睹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一生難忘的景象：大約五十位主教和四十位來自各國的神父，身穿莊嚴的祭服，走進了上海徐家匯的聖依納爵主教座堂。

今年六月，我們在澳門觀看了一段展示那一刻的簡短影片。觀看這些影片片段，確實是一種令人感動的經歷；在中國，這場會議堪稱是空前、而此後也可能不再有了。遊行隊伍的中央是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這一歷史事件的關鍵人物。

上海教務會議的籌備工作、教會的文化調適和本地化的過程，此前更可追溯至近百年前，亦即 1850 年代，當時許多人認

² 相關整理請參：編輯室，〈中國教務會議百年：相關報導與整理〉，《神學論集》221 期（2024 秋），412~420 頁。

爲由於中國傳教的特殊和困難條件，這些目標永遠無法實現。法國政府一直反對教宗代表直接干預中國事務。殖民政治、修會分歧、甚至許多傳教士的反對，導致這些嘗試的失敗，包括 1860~1862 年教廷特使斯佩爾塔（Celestino Luigi Spelta）的嘗試。

1885 年，羅馬總修院³的一位傳教士朱利安內利神父（Fr. Francesco Giulianelli）率領一個梵蒂岡使節團前往北京，尋求與中國當局達成協議。雙方達成協議，羅馬教廷任命阿利亞迪總主教（Archbishop Antonio Agliardi）爲駐華代表。而當時的反教權法國政府，掌控了在華天主教的保教權，威脅教宗，揚言將對法國天主教會進行報復。教宗良十三世因而非常不情願地被迫推翻了他的決定，儘管該決定已於 1886 年 8 月 12 日在《羅馬觀察家報》上發表。

教廷傳信部部長本篤·高蒂（Benedetto Gotti）採納了舉行主教會議的提案。本來計劃於 1914 年召開，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取消。1919 年教宗本篤十五世發出傳教通諭《夫至大》之後，羅馬教廷責成光若翰主教於 1919~1920 年間視察全國教務。

正如學者所承認的那樣，《夫至大》正是爲了福傳中華而寫的，即使教宗沒有明示。來華傳教機構在實現中國教會的本地化和文化調適方面進展緩慢，甚至加以抵制。對許多人來說，中國教會似乎是一塊外國飛地，其中包括秦噶嘑（Joseph Gabet，遣使會）、雷鳴遠（Vincent Lebbe，遣使會）、湯作霖（Antoine Cotta，後

³ 羅馬總修院 1926 年與米蘭外方傳教會合併成爲宗座外方傳教會。

來加入瑪利諾會)和日後成為真福的保羅·曼納(Paolo Manna, 宗座外方傳教會)。本篤十五世接受了改變的呼籲,並批評了傳教士的民族主義做法和缺乏本地化的努力。

教廷在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傳教通諭《夫至大》的推動下,1922年8月12日任命剛恆毅主教為宗座駐華代表,其任務有三:負責籌備全國教務會議;更新傳教方法;並為建立中國教會聖統制做準備。此方針並得到其繼任者庇護十一世的認可。同時傳信部部長王老松樞機主教也呼籲:在1922年前召開中國地區性的籌備會議。

剛恆毅是個有使命感的人,願意在中國有效地執行教宗的決定,並且很有效率。他在湖北武昌召集了22位中外神父,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為會議的早日召開做準備,確定了會議的議題和進展細節。剛恆毅的工作對於實現中國本地化和文化調適是不可或缺的。他在上海會議的召開之前及之後,都面臨了許多阻力和懷疑,他在其日記中寫到:「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是與《夫至大》一起反對傳教士,還是與傳教士一起抵制《夫至大》。」事實上,許多傳教士在履行自己的使命時都處於某種自相矛盾的狀態:他們願意為信徒獻出生命,但又不夠慷慨,不允許當地的信徒和神職人員在自己的團體中擔任領導角色。

上海會議持續了近一個月,由五個委員會指導工作。與會代表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屬於不同的修會團體和傳教機構,他們代表了中國所有的宗座代牧區。其中僅有的兩位中國籍監牧(他們不是主教),分別是蒲圻的成和德以及蠡縣的孫德楨。其他

九名中國神父也參加了這項活動，儘管他們的職位可能並不顯赫。無論如何，這是中國本地神職人員開始受到重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跡象，但這還不夠。

由於各地教會領導及其修會的國籍不同，上海會議旨在有序地、系統化及多樣化的傳教和牧靈實踐。在最終文件中，神職人員、平信徒和善會的培育和角色，受到特別關注。不過，除了最終決定的具體內容之外，重要的是上海會議為中華天主教會帶來的氣象。天主教徒滿懷喜悅和熱情，迎接源自上海的新牧靈方向。上海會議之後，對中國天主教徒來說，將信仰與文化認同毫無矛盾地結合起來，相對更容易。儘管如此，外國各級神職人員中的保守派仍然反對改革。

上海會議閉幕式於 1924 年 6 月 12 日舉行，如同開幕式一樣，是一場令人難忘的活動。中國被奉獻給童貞榮福聖母瑪利亞。與會代表們一步步登上祭壇的台階，簽署了兩份最後文件，同時唱著感恩的〈讚美頌〉。

上海會議是中國天主教會歷史上具有首要意義的歷史事件。它產生了許多直接的後果，此處只舉出下列幾項：

✧ 1925 年，天主教輔仁大學在北京成立（現遷至台灣新北市），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構，旨在培訓當地神職人員和平信徒，並促進文化適應進程。

✧ 1926 年 10 月 28 日，第一批六位中國主教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親自祝聖。

✧ 同樣重要的是，教宗庇護十一世在幾個月前的 1926 年 6

月 15 日廢除了法國對中國傳教事業的民事保護權。這標誌著殖民主義對中國傳教事業的干預正式結束。

- ✧ 1928 年，剛恆毅創立了一個國籍神父修會，取名為「主徒會」（CDD）。此事他已經考慮了數年，現在總部設在台灣。這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當地神父修會，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此類性質的傳教修會。
- ✧ 1930 年，剛恆毅在輔仁大學建立藝術系，推廣了聖像畫的中國風格。畫家陳緣督是此機構中最主要的藝術家。
- ✧ 1939 年 12 月 8 日，那時已經回到梵蒂岡的剛恆毅以傳信部秘書長的身分，啟動並共同簽署了一項經過庇護十二世批准的傳信部簡短指令，允許施行中國禮儀。梵蒂岡的指示認為，這些禮儀僅僅是民事的、文化的和政治性的，推翻了先前教宗本篤十四世的宗座憲章《自朕登基以來》，該憲章莊嚴而明確地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加這些禮儀。

二、關於上海會議的三個研討會

2024 年，在中國教務會議一百週年之際（202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2 日），舉行了各種學術活動。第一次研討會於 5 月 20 日在米蘭聖心天主教大學舉行。第二次研討會於 5 月 21 日在羅馬烏爾班大學舉行。這兩次研討會顯然是相互關聯的：米蘭的研討會以學術為導向；羅馬的研討會則側重於教會外交，並以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協議問題為背景，兼討論其未來的展望。事實上，這兩次研討會都邀請了中國主教、神父和學者，以及意大

利和各國同行參加。

在羅馬，教宗方濟各發表了視頻致辭，而國務卿帕羅林樞機主教（Card. Pietro Parolin）和福音傳播部副部長塔格萊樞機主教（Card. Luis A. Tagle）親自出席並發表了講話。他們經過斟酌的言辭，旨在繼續與中國當局進行艱難的對話，而中國當局正是這兩次會議上表達的許多希望的實際接受者。事實上，組織這次活動，就是爲了方便梵蒂岡當局與中國傑出主教、學者和中國權威當局會面的機會。

第三次研討會於6月26~29日在澳門聖若瑟天主教大學舉行，題爲「第一次中國教務會議（上海會議）：歷史與意義」。近百人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其目標基本上是教會和傳教的。與會者中有學者，大多數是中國人，其中許多人很年輕，幾乎都是天主教徒，來自「大中華區」，即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澳門。少數非華裔人士都是經驗豐富的傳教士兼學者，他們一生都致力於在華傳教。來自聖座駐香港的兩名外交官員也出席了會議。大會的科學委員會構思並組織了這次會議，他們做出了一個具體的決定，即爲來自大中華四個地區（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年輕中國天主教學者提供空間。

這次在澳門舉行的研討會，在方法上非常具有學術性。會議中，學者們就上海會議的特定歷史面向和教會後來的發展提供了涵蓋周延的一系列演講。會議開始時，有兩段視頻致辭，一段來自福音傳播部副部長塔格萊樞機主教，另一段來自香港榮休主教湯漢樞機主教，以及澳門李斌生主教的問候。出生於

香港的韓大輝總主教，現任聖座駐馬耳他大使，曾擔任福音傳播部秘書長，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發言人之一。⁴

韓大輝總主教在他的講話中，大量引用了剛恆毅樞機的回憶錄，首先是「願中國屬於中國人，中國人屬於基督」的座右銘。剛恆毅總主教賦予上海會議的目標是「每個傳教團體的雙重目的：傳播福音和建立由當地神職人員管理的教會……。撒種的方法要優於直接從歐洲移植樹木的方法」。韓大輝讚揚剛恆毅主張「學會傾聽當地文化」的必要性，並通過適當的培訓來提升本地神職人員，讓他們擔任領導和尊貴的職務。韓大輝總主教指出，剛恆毅開放了教會的大門，採用中國的建築、音樂、藝術，甚至神職人員的服裝。

此外，另有一場學者在北京的聚會，但是相關的公開報導卻很少，因而本文在此從略。

三、後殖民主義對中國傳教事業的批評

在這些研討會上，觸及了傳教事業和殖民侵略的主題。而在澳門的研討會中，我提出了真福保祿·曼納神父和剛恆毅樞機主教之間的比較。

（一）剛恆毅和保祿·曼納：中國傳教改革的倡導者

曼納，在上海會議結束僅兩個月後，當選為宗座外方傳教

⁴ 詳參：韓大輝，〈剛恆毅的殘葉和智慧：中國首屆主教會議百週年紀念隨思〉，《神學論集》221 期（2024 秋），385~411 頁。

會會長。1927 年，曼納開始了為期近兩年的東亞傳教之旅。1928 年 8 月 20 日，這兩位傑出人物在北京相遇，並在一起度過了很長時間。他們討論了困擾中國傳教事業的各種問題，包括禮儀之爭。曼納回國後，寫了一份冗長的報告，其中他大膽地提出一些非常新穎的建議。這份文件題為《關於現代福傳方法的觀察》，並提交給羅馬教廷，在那裡被保存了近 50 年，沒有得到任何答覆。直到 1977 年它才首次出版。⁵

曼納對中國傳教事業的批判性解讀，與剛恆毅的觀察沒有太大區別。曼納譴責了四個他所說的「鎖鏈」，這些鎖鏈阻礙了天主教信仰在中國的傳播，即：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o）；依賴（dipendenza）金錢；外國政府的保護和聯盟；未能提升本地神職人員，及其培訓不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建議可能顯得太「大膽和魯莽」。

（二）傳教士是殖民主義者嗎？

剛恆毅和曼納對傳教士的批評令人印象深刻。相當多的傳教士，作為他們那個時代的產物，患有一種相當奇特的症狀：一方面，他們願意為中國人獻出生命；另一方面，他們卻不準備讓當地神職人員擔任領導角色，並與他們並肩而坐，像兄弟一樣享有平等的尊嚴。

⁵ Giuseppe Buono 為 EMI 編輯了這份未出版的文件的刊印本（Bologna, 1977，後續還有其他版本）。在本文中所直接引用的文句，是出自此版本的翻譯。由於此出版品的隨筆風格，筆者將不再標明頁碼。

曼納對政治保護造成的損害感到憤慨。他呼籲將天主教「從所有政治保護主義中解放出來，從所有世俗問題中解放出來」。法國的保教權是一個「嚴重而可怕的障礙」。它非但沒有保護傳教事業，反而扼殺了它。

後殖民主義和中國宗教政策（在各種文件和白皮書中，甚至在羅馬會議的發言者中，都有說明）對傳教事業的批評，似乎與剛恆毅和曼納的觀點一致。中國官方的宗教政策認為，天主教是由帝國主義帶到中國的外來宗教，引起了人民的負面反應。因此，目前的中國宗教政策有理由排除任何外國干預中國內政，包括宗教事務。

然而，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傳教運動並不僅僅是殖民主義的一個片段。此外，剛恆毅和曼納永遠不會同意傳教士對中國人民產生了負面影響。相反，通過他們的社會、教育和衛生項目，大多數傳教士都真誠而慷慨地致力於中國人民的福祉，並且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他們不僅建造教堂，還提供面向所有人的教育和衛生服務，建立診所、醫院和孤兒院，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此外，他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來拯救女孩，賦予年輕女性權力，反對纏足和送走、遺棄或賣掉女嬰的做法。由於女修會的存在，許多女孩和年輕婦女接受了教育，並有機會脫離家庭的束縛，做出生涯的選擇。以往有許多年輕婦女被迫做出違背自己意願的人生選擇；而在宗教團體中，她們可以擁有更多的自由和機會。

傳教士，無論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都是跨文化交流的

推動者，他們引入了新的科學和文化知識。由於他們創辦的學校和學院，他們是現代性的載體，帶來了關於科學和西方思想的新思想和知識。西方科學和民主成為五四運動（1919年）最有號召力的口號。

在我看來，單方面強調過去的錯誤，而從不提及對宗教的迫害，是不對的，因為這些運動確實發生過，給中國天主教團體造成了難以言喻的痛苦，而他們唯一的錯誤就是屬於一個普世信仰。

（三）「福音就是自由的同義詞」

曼納寫道，傳教士必須相信福音的力量，而不是外國的保護，並且遠離政府，因為政府的目標與傳教士的目標背道而馳。事實上，中國政府最害怕的是人民成為基督徒，因為「福音就是自由的同義詞」。真福曼納神父的這句話應該銘刻在石碑上，尤其是在我們這個不喜歡自由的時代。

今天，在中國，我擔心現在在香港也是如此，有一種政治民族主義，它像一個「新的保教權」一樣，試圖以一種侵入性和普遍的方式滲透到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傳教不是製造基督徒的機器

曼納痛苦地觀察到，不僅政治權力，金錢（傳教）也弊大於利。他譴責用金錢來作為傳教活動的最終標準，傳教活動被簡化為一臺「製造基督徒的機器」。另一句要銘記的話：傳教不是「製造基督徒的機器」。我記得讀過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一句話，

大意是：傳教不是把人從對手的陣營帶到我們的陣營；傳教的成功不一定以人數來衡量。

傳教工作對金錢的依賴，是對福音邏輯的獨特扭曲。曼納說，教會必須回歸早期教會的形式，信徒必須真正相信福音。畢竟，傳教是一份禮物，而無償性是禮物成為禮物的基本條件。

傳教一直是播撒在廣闊田野中的一粒種子。傳教士的數量、他們的培訓和他們的素質，相對於事業的浩瀚，總是嚴重不足。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雄辯地證明，基督徒經驗的意義不能用會計結果來衡量，無論是數字上的、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而應以其福傳品質來衡量。

（五）翻譯是一種不可能的必要性

曼納說，天主教必須在每個國家都感到「賓至如歸，消除任何異國情調的特性」。他主張文化適應，即使他沒有使用這個當時並不存在的術語。曼納稱「西方主義」是一種應受譴責的做法；相反的，應該「盡可能地在生活、思想和藝術中，採用每個國家好的東西」。

曼納指出，中國的哲學和宗教思想可以為中國的天主教提供有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早期希臘和拉丁天主教提供的東西。利瑪竇也曾提出過同樣的觀點。然而，當曼納在寫這份報告時，利瑪竇和中國禮儀仍然受到羞辱與禁止，很少被提及。至於未來神父的培養，曼納建議，西方文化和拉丁經典不應成為修道院和神職人員的必修課；他們應該精通中國文化和經

典。傳信部秘書長博爾吉亞（Stefano Borgia）在 1787 年也提出了一些類似的改革（我們後面將會回來講論他）。

曼納意識到，福音必須用中國語言、文字和文化翻譯給人民。福傳始終是用另一種語言傳講的福音的翻譯。人們必須接受翻譯的風險，正如天主已經接受將神聖的話語翻譯成一種不完美的語言給我們一樣。然而，我相信文化適應及其自然而然的翻譯過程，是一種自發的現象。它伴隨著生命而來。矛盾的是，即使是那些聲稱反對它的人，他們仍然在進行文化適應。只要一個人活著並且相信，文化適應就會發生，信仰就會被翻譯成新的語言。

根據曼納的說法，缺乏本地神職人員和修道生培訓的不足，是天主教傳教事業的一個嚴重失敗。這個問題並不新鮮：關於本地神職人員及其培訓的沒有結果的討論，至少已經持續了三個世紀，至少在其指示中，羅馬教廷主張必須提升本地神職人員。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傳教士，如遣使會的秦噶嘑、後來加入瑪利諾會的湯作霖、遣使會的雷鳴遠神父等人（曼納引用了秦噶嘑和雷鳴遠的話），以及馬相伯等中國教會人士，都談到了這個問題，但幾乎沒有人聽他們的。

（六）傳教士是外國人，但牧者（代牧或主教）必須是在地人民

150 年前，博爾吉亞在教宗庇護七世時代成為樞機主教和聖座傳信部部長；在 1787 年，博爾吉亞向聖座提交了兩份極具創新性的備忘錄。標題很雄辯：「關於任命中國主教的必要性」。

他寫道，禮儀必須使用中文；當地主教應擔任領導角色（「傳教士必須是外國人，但牧者必須來自在地人民」）；不應強迫聖秩候選人必須學習拉丁語。這些建議都沒有得到答覆，就像曼納的建議一樣。

曼納甚至提出了最大膽的建議：中國神父不應有獨身義務（這個建議是在 1929 年提出的）。想擔任聖職的候選人應該是成年人，願意將福音作為他們生活的原則。他提出了傳教員的典範：他們在社區中享有良好的聲譽，受人尊敬。司祭應該從他們中間選出；曼納繼續說道：牧者（主教）也是。

獨身不能被列為比靈魂得救更重要的事情。「如果用拉丁語、科學和獨身主義，你就是把許多靈魂關閉在天堂之門外，誰會受益？不是天主，不是教會，不是靈魂。只有魔鬼才會受益，而一個人真的不應該為魔鬼工作」。

四、何時會舉行第二次中國教務會議？一份議程建議

令我震驚的是，上海會議被稱為「第一次中國教務會議」。那麼，何時會舉行第二次中國教務會議呢？我覺得非常需要這樣做。這次會議將符合教宗方濟各希望教會今天擁有的同道偕行的合議精神，它必須包括天主子民以其豐富多彩的神恩和職務參與。

第二次中國教務會議將面臨許多緊迫和開放的挑戰。一百年前，政治反對如此強烈，以至於對許多人來說似乎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們可能也有同樣的感覺。中國教務會議如何才能

擺脫政治干預？

跨文化表達了福音與不同文化和脈絡互相碰撞時的複雜且沒完沒了的教會組織和神學的工作任務。這是一項天主聖神託付給天主子民的任務。它不能與中央政府當局強制執行的「天主教中國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綱領相混淆。中國的天主教團體今天在福傳使命中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些挑戰可以通過與普世教會的團結和支持來化解，正如一百年前在上海所表現出的同樣的勇氣和決心一樣。

我們必須保持希望，希望中國教會擁有必要的自由、團結和平安，以開展適當的神學和牧靈反思，以迎接後現代人類的福傳挑戰。

我已經考慮了第二次中國教務會議的可能議程。事實上，我之前已經在不同的場合提出過這些建議。然而，我覺得這是一個特殊的機會，讓我重新表述和介紹它們。

關於跨文化問題：中國文化與禮儀的創造性融合仍然不足。天主子民必須找到方法，通過適當的文化習俗和崇拜形式來表達他們的信仰，這些習俗和形式能夠將中國豐富的文化傳統與天主教信仰聯繫起來。

中國大規模的農村向城市移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農村和城市天主教會之間的差距。前者往往是傳統的和虔誠的，往往無法克服離開自己的天主教教友村所產生的失落感。城市中的基督徒則更加開放地接受現代性的要求，並關注生活在擁擠的大都市生活中靈修。住在大都市的教友，必須和來自遙遠省份

村莊的教會內兄弟姐妹學會共同表達他們的信仰，接納並歡迎他們的多樣性。

受洗的教友（也稱為平信徒）必須成為福傳，以及走向外面社會、慈善工作和教育活動的主角。與世界各地的情況一樣，年輕人的脆弱性是一個需要緊急處理的問題，特別是因為支撐老齡化人口的重擔落在了他們的肩上。

培養女修會和神父使其具有當今世界的敏感度，是一項緊迫任務。研究表明，在中國和其他地方，年輕的修女及修士都很難處理他們的情感和心理需求。

在 1980~1990 年代，「宗教熱」和「文化基督徒」這兩個詞彙，描述了人們對基督宗教的興趣增加和基督徒人數增長的現象。儘管缺乏明確的統計數據，但近年來天主教徒的人數似乎在減少。這可能是由於老年信徒人數的減少、疫情的影響，以及新生兒人數的持續下降。此外，宗教政策減少了兒童和年輕人接受信仰的機會，因為在許多地方，他們不被允許進教堂或參加宗教培訓。

還需要為許多居住在國外的華人制定福傳計畫，因為他們在國外遇到天主教信仰的機會要大得多。

最後，我向在上海佘山聖母大殿中深受中國天主教友愛戴和敬仰的進教之佑聖母瑪利亞祈禱。我們把中國和世界的自由、合一、正義與和平託付給她。